

正义·分配正义·社会正义

颜景高

(山东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大致而言,中国的正义观念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利益攸关的客观认知。“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农耕文明时代的正义诉求,“按要素产权分配”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分配共识,“按需分配”则是马克思基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设想。在当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效率的激活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发育,因而生产要素产权的清晰界定成为必要。从本质上说,生产劳动是历史进步的根基,劳动者是社会创新的主体。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健全生产要素分配机制,唯如此才能更加切近社会正义的真正内涵。

关键词:正义;分配正义;社会正义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0)03-0064-07

一般而言,中国人的正义观念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利益攸关的客观认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正义观念的研究主要是从如下几个层面展开的:一是引进并阐述西方的正义理论,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观,普遍关注他的“基于平等”的正义观;二是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研究,特别是“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围绕“效率与公平”问题,揭示中国的分配正义原则。概括地讲,学术界关于正义观念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正义观念并不是一个中西通用的概念,学者们正在着力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分配正义理论,以引领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的维度,挖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义观念形式变迁背后的现实依据,发掘中国社会“要素分配体制”创立的历史背景及其独特性,从而深刻揭示支撑中国“按劳动分配制度与按要素分配体

制”共存的社会正义理念。

一、正义观念的发育

正义概念是一个颇为古老的词汇,它的发育经历了一个久远的历史进程,它所蕴含的复杂思想更是历久弥新,迄今没能达成观念的广泛共识,正如博登海默所指认:“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化无常”^[1]。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层面来讲,“正义”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精神诉求,而是特指一种社会的伦理秩序。依据《说文解字》的诠释,作为复合词的“正义”意味着“守一,行宜”,即守原则,行得正。大致说来,正义的落实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义,即为政之义,意味着统治层面上的政治措施要符合“义”,正如《论语·颜渊》所记载,“政者,正也”;二是行义,意味着社会层面上的个人行为要符合“义”,正如《说文解字》所指认,“义,己之威仪也”。概而言之,“正义”的核心在于“义”的遵

收稿日期:2020-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19FZX087);山东省高校青创人才引育计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颜景高,男,山东临沂人,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循,这鲜明地体现在“义利之辨”的诠释之中。孔子强调“义”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如“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等等,孟子进而发掘出了“义”的人性依据,即“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则将“义”上升为社会礼法体系的基础,如“天下之要,义为本”(《荀子·强国》)。随着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义”的遵循逐渐衍变为服从于“三纲五常”的封建等级秩序。从中国民间传统的大众认知层面来说,“正义”本身并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意味着一种“平等权利”的追寻、“均等收入”的确认,这集中呈现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社会思潮之中,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控诉,“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呼吁,以及“一律平均。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的设想等等。

顺应广大底层群众的正义愿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瓦解了封建传统社会的等级特权秩序,进而初步构建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正义原则。这鲜明地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之中。“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不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并且拥有了政治参与的话语权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逐步开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纲领。遗憾的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囿于时代局限,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及其实现路径作出了错误的决策,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而夸大所谓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最终酿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事实上,“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

社会主义构想,事实上是行不通的”^[2]。

改革开放就是从打破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模式起步的,因为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正义观缺乏提升生产效率的动力、推进经济发展的活力,根本无法从基本制度层面上支撑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其一,虽然“平均主义”符合部分底层群众的思想认知水平,但这种原初的正义观念源自于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发展阶段,产生不了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生产力。其二,瓦解传统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就要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分配正义观,允许一部分人在合法经营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辛苦劳动先富起来,进而起到“少数带动多数”的榜样示范作用,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3]进而言之,“按劳分配”更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配正义理念,进而成为改革开放之后分配体制改革的根本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随之更新的分配正义观念实现了华丽转身,较好地适应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正如克拉克所说:“对于实事求是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在各个要求获得应得权利的人中间分配财富的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4]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变迁历程来说,党在十三大报告中确立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分配原则,抛弃了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观念。自此以后,我们逐渐摒弃了生产要素收益的“剥削性”,并且认定了生产要素取得收益的“合法性”。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告,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进而框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

法理性。严格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义观念的真正发育,并不是源自于政治观念层面上的辩论和交锋,而是根源于经济层面上的历史变革。进而言之,中国的正义观念变迁根源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度推进以及随之更改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

二、分配正义的澄清

要素分配理论的诞生源自于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而分配正义是自由市场逐渐成熟的必然要求。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只有允许、鼓励并且保护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一个国家或者说社会的经济才是最有活力的,因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根本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只要能够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的自由权利,就能自然实现社会和谐和分配正义,因为生产诸要素的自由竞争保障了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经济的自动调节。萨伊进而认为,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都应该参与财富与价值的分配,从而提出了影响至今的生产要素分配正义法则。他说:“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除这些外,没有其它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7]由此可知,在古典经济学界定的分配视域中,各种生产要素均平等参与分配是正义的,保障诸要素平等参与分配的权利是正义的,也是必须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在权利保障和规则平等的意义上澄清了分配正义的内涵,正如学者柯武刚所归纳:“他们认为,当政府被赋予一种再分配职能时,它会因此而不按照形式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公民;政府的古典角色仅仅是维护法律和平;但当再分配成为西方社会政府的一项事务时,个人自由权和法治就处于被削弱的危险之中。”^[8]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承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更加崇尚市场秩序的自然调

节,更加注重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保障,究其实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分配正义”的核心理念在于“规则平等”的维护。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普遍认可依据“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正义法则,认定自由市场收入分配的道德原则是按照个人所拥有的市场要素进行分配。

由此可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希冀的“分配正义”,绝不是“分配结果”的平等,而是“分配规则”的平等。哈耶克指出:“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乃是有助于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也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7]依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追求“结果平等”是人类美好的乌托邦设计,往往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因而是“非正义的”。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分配正义规则的平等性要求,但他们坚决反对追求最终结果平等的分配规则。进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将那种经由主观思考而选定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企图,而不论它是一项平等的措施还是一项不平等的措施”^[8]。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定的“分配正义原则”,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和自由交换的产物,并不是人为设想而制定的分配规则。

从市场经济发展历程来讲,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要素分配原则提高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这鲜明地体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多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等等。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也带来了国家财富不均、社会贫富分化等不平等后果,因为迄今为止,各个国家实施的社会保障、帮扶、救助等保障政策也没能改变社会各阶层日益分化的状况。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彰显了99%的示威者对1%的金融巨头的强烈抗议,正在摧毁着资本主义世界引以为傲

的平等信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焦点很快就超出了华尔街并触及美国社会更广泛的平等现象。”^[9]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富分化呈现出日益拉大的趋势,进而引发了国内舆论界对市场效率与不平等状况的广泛讨论,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82年我国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但到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估计的全国基尼系数达0.454;2007年达0.47”^[10]。

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息息相关,因为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活力的同时,往往引发分配不等、收入不均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是非正义的,也不能把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直接归咎于要素分配原则,更不能在分配领域妄下“市场悄然退出、政府强势介入”的武断结论,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并不在于如实遵循完全市场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而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总是受到外在干扰,甚至非法侵害。何建华认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复杂的,非市场化的过渡性的收入分配以扭曲的方式拉大了收入差距,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公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平等竞争形成的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二是以腐败为代表的非法收入极大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拉大。”^[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并不是所谓的市场体制所引发的“马太效应”,也不在于过渡市场化问题或者要素分配原则问题,而在于部分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权力寻租”乱象。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利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2]

实际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现实的、动态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在“市场失灵”频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则承担着维护公正的职责,因为“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13]。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成长的产物,而是中国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因而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更为错综复杂。一方面,政府调节有可能失灵,因为政府处于“作为某些高度必需的公共物品——例如国防、警察和消防、公路——垄断者的地位”^[14],往往缺乏提高效益、增加盈利的利益驱动,从而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配置错位。另一方面,政府有可能劫贫济富,因为“迫于个人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的强制力会有可能被用来剥夺穷人而救济富人,从而使政府的权力成为一种提高不公平的工具”^[15]。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退出市场经济活动的领域,因为从本质上讲,市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的核心部分。进而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虽然出现了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现象,甚至出现了“权力寻租”的市场乱象,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直接退出”,而是预示着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唯有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正义的光芒。

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优势,推动市场要素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创造社会财富。至于市场机制管不了和管不好的公共资源配置,政府就要加强和优化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毋庸置疑,转变政府职能与健全市场机制是双向互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实践中持续拓展,在认识上

不断深化,才能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演进态势。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机制保障:一方面,私有产权主导的收入分配机制首要保障的是资本者的利益,因而不可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普通劳动者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创造的社会财富,才真正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这是社会公益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把握“政府和市场”互联互动的辩证关系,在保障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彰显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唯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力,从而创造全民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的良好局面。

三、社会正义的界定

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维度讲,分配正义问题并不是抽象的政治要求、传统的等级制度设计或冰冷冷的法权规定,而是应该从生产与分配的内在关联中解读的社会正义原则。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社会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组成了社会再生产系统的整个流程,因而分配正义必须考虑产品(或者说财富)的来源,进而确定分配的依据和正义的原则。依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所有社会物品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国家财富的直接来源。他明确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16]但吊诡的是,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在财富生产问题上自发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但他们在财富分配问题上却自觉地认定“按要素分配”是符合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的。

马克思认可了“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历史性贡献,进而提出了财富分配两重性统一的学说。一方面,马克思承认财富是由多种生产因素

创造的,因而认同“依据要素分配是正义的”理论。他曾在《资本论》中转引威廉·配第的财富创造说,认同劳动并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任务。另一方面,马克思虽然认同“要素分配”理论的重大意义,但他还是坚决主张分配中“劳动要素”的基础性地位,因为人的“活劳动”(相对于生产资料等“死劳动”而言)在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在《资本论》中清晰指出:“不参加劳动过程的机械,是无用的。不仅如此,它还会在自然物质代谢的破坏力下解题。铁会生锈,木会腐朽。不织也不编的纱,会成为废棉。它必须被活的劳动捉住,并从死梦中被唤醒,从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能动的使用价值。”^[17]进而言之,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是奠基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他并没有仅仅将“劳动”作为普通的生产要素来看待,而是将它看作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二重性的统一。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上说,社会正义的探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社会分配的层面上予以澄清,而应该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而在生产方式的层面上予以界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可以自我掌控的生产资料,以巨额资产、先进技术等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要素的所有权往往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劳动力要素往往处于被其它生产要素决定的地位,从而劳动者不得不处于被非劳动者控制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得成为别人的奴隶。由此可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即使这个社会已经建立了规范的要素分配体制机制,因为所谓的权利保障和规则平等都是建立在绝对维护“生产要素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所有制条件下的分配正义问题是无解的。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想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制度。一方面,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实施的“按劳分配原则”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它能够消除政治特权的干扰,避免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剥削,进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理论,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是个人消费资料分配的唯一根据。另一方面,“按劳分配原则”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虽然强调了人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却忽视了人自身的“个性需求”。进而言之,“按劳分配”相对于“按资分配”是正义的,但是相对于“按需分配”是较低阶段的社会正义,而“按需分配”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实现。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中国难以避免多元分配机制的长期存在。从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维度来讲,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仍将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虽然这种分配制度在现阶段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但它逐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进而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实际上,“按劳分配原则”扬弃的是“资本奴役劳动”的价值理念,抛弃的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制度设计,宣扬的是“劳动者是社会主人翁”的思想观念,打造的是劳动者权益受到保障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逐渐加速,提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普遍共识。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要素分配”制度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既要坚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要深化“按要素分配”的市场化取向,从而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正是在此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正

义原则,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18]。

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资本收益率的攀升,进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资本收益率更是居高不下。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企业发展层面来说,超常规发展的企业大多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其二,从就业者收入层面来讲,普通工人的劳动报酬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概而言之,中国的资本收益是逐步提升的,而劳动报酬则是相对下降的,这必然导致中国未来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部分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92年企业部门劳动报酬比重为27.57%,到2001年已迅速下降到22.45%,下降了5.12个百分点,显示出波动中下降的特点。……与企业部门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趋势相对应,企业部门资本性收入在1992年以后则呈现出波动中回升的态势”^[19]。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20]。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充分体现对大众公共需求的满足,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特殊需求的关怀,因而政府要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做好调节工作,切实保障“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实施等”,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所谓的官办贫济事业的部分”^[21]。从本质上说,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翁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收入水平彰显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目的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莱施哈克对分配正义作出了正确概括:“‘分配正义’,又叫‘经济正义’或‘社会正义’,是当今许多人的说法。”^[22]具体而言,我国政府要在

两个方面切实保障并有效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对于创新劳动者,要强化服务,做好培养科研人才、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政府扶持;对于普通劳动者,要细化管理,做好社会基本保障的政策托底。

四、结语

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正义观念的发育源自于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活积淀,分配正义理论的建构源自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实践,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源自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紧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揭示新时代中国市场经济“按动分配制度与按要素分配体制机制”的理论基础,它追求的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社会正义观,这是一个有待开启的重大历史课题。

参考文献:

-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1.
-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R].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565.
- [3]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M].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
- [5][法]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76.
- [6]柯武刚.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4.
- [7][8][奥]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02,105.
- [9][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M].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序言 VI.
- [10]李实.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
- [11]何建华.分配正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2—283.
-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288.
- [13][法]佩鲁.新发展观[M].张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5.
- [14][美]缪勒.公共选择[M].张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150.
- [15][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郑秉文,译.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103—104.
- [16][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
- [1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3.
- [18][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9]张小平,等.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5.
-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3.
- [22][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分配正义简史[M].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2.

[责任编辑 杨捷]

Justice. Distributive Justice. Social Justice

YAN Jinggao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02, China)

Abstract: China's concept of justice is not an abstract theoretical deduction, but an objective cognition of the interests at stake. "Not suffering from scarcity but suffering from inequality" is the justice demand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era.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ccording to factors" is the distribution consensu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needs" is Marx's general assumption based on the future communist society. The activation of economic efficienc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so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the property rights of production factors.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distribu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o as to get closer to the true meaning of social justice.

Key words: justice; distributive justice; social justice